果戈理的嗤笑与苦笑

无锡市第一中学  刘臻

1835年12月，果戈理完成了他的五幕讽刺喜剧《钦差大臣》。第二年4月，该剧在彼得堡公演，据果戈理自己说，“观众在大体上是满意的。一半甚至带着同情接受这戏剧；另一半照例骂它，但是由于不属于艺术范围的原因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极化的评价？“艺术范围”之外的原因又是什么？
 这部戏剧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俄国的一座外省小城。市长安东诺维奇收到彼得堡秘信，得知即将有钦差大臣到小城微服视察。此消息令这个色厉内荏、在官场打了三十年滚的“老油子”极度不安，于是他召集他的“班底”——慈善机关管理员宰姆略尼卡（他治下的医院，病人衣衫褴褛，“像铁匠一样”）、学校视察员赫洛博夫（其所辖学校的老师并无学识，唯一的特色是朝学生扮鬼脸）、法官贾布金（其办公室里挂的是打猎的皮鞭，陪审员身上的气味“像刚刚从酿酒厂里出来似的”，办事厅堂里还畜养了一群鹅）、邮局局长施其金（此公的爱好是拆看他人信件），一起商量对策。好巧不巧，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赫莱司达阔夫，因输光了赌本，困居旅馆，骗吃骗喝，大呼小叫。赫莱司达阔夫不同寻常的做派引发了小城官僚们的误会与恐慌，于是好戏开场了……
 误会的魅力在于“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”，因此为古今中外戏剧家们所偏爱。李渔的《风筝误》，莎士比亚的《无事生非》《仲夏夜之梦》，都是利用误会营造出戏剧性与喜剧效果的佳作。

《钦差大臣》一剧里，误会无所不在。例如第二幕，安东诺维奇战战兢兢来到赫莱司达阔夫寓居的旅馆，适逢赫莱司达阔夫因“吃白食”与旅馆老板发生龃龉。初次见面，赫莱司达阔夫撒泼耍赖，安东诺维奇心怀鬼胎，言辞间产生的误会令人捧腹。赫莱司达阔夫抱怨食物质量，安东诺维奇立刻澄清“这实在不是我的错处，市场上的牛肉永远都是新鲜的”；安东诺维奇邀请赫莱司达阔夫“搬到另外一个住所去”，赫莱司达阔夫又以为是要将他投入监狱，叩拳击桌表示抗议；赫莱司达阔夫过激的反应令安东诺维奇瑟瑟发抖，哀告“官家的薪俸甚至不够买茶叶和糖”，主动说出了自己曾收受“一点点”贿赂；赫莱司达阔夫则以为对方是以此要挟恐吓自己，声明自己没有钱；“会意”的安东诺维奇立刻递上“二百卢布”（实则为四百卢布）……鸡同鸭讲的对话渐渐“合榫”，错位的语言高度凝练，两人骗子与流氓的本色跃然纸上。

赫尔岑说《钦差大臣》是“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”，评价很形象。果戈理借误会这把“手术刀”，批郤导窾，将俄国官场的异象入木三分地展现给读者。第四幕，赫莱司达阔夫分别会见市长僚属，他用几乎同样的台词向法官、邮政局长、学校视察员、慈善机构管理员各“借”了三百卢布。这群人先是诚惶诚恐，继而各掏腰包，互揭丑事。第四幕里，安东诺维奇的太太安娜·安德列夫纳与他的千金玛利亚·安东诺夫纳对赫莱司达阔夫争相献媚，在赫莱司达阔夫向玛利亚求婚成功、扬长而去后，母女俩做起了发迹的春秋大梦。在他们可笑又可鄙的行为背后，藏着肮脏又丑陋的灵魂。

喜剧不是闹剧，漫画式的笔法也不等于恶谑。为什么一个年仅23岁，“有点愚蠢”“说话和行动没有一点考虑”的赫莱司达阔夫能把这班久历宦海的“体面人”玩弄于股掌，“小泥鳅”也能掀起大风浪？在嘲弄这群混蛋的同时，果戈理看见了更深刻的东西。毕恭毕敬、奴颜媚骨、满口仁义道德的安东诺维奇，在赫莱司达阔夫离去后，立刻质问揭发他罪行的商人。安东诺维奇甚至筹划进入彼得堡成为将军，向身边的人不断承诺、许愿。安东诺维奇们作威作福、寡廉鲜耻的行为，令果戈理深恶痛绝。他说：“我决定在《钦差大臣》中，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……痛快地一并加以嘲笑。”其创作初衷表明：这位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完全是蓄势而发，他要以文学为诊断、疗救的工具，来痛快淋漓地剖析俄国社会的沉疴痼疾。这是何等的雄心！

据说，果戈理的墓志铭援引自《耶利米书》，铭文是“我将嗤笑我的苦笑”。我觉得铭文与鲁迅先生对果戈理的评价——“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，振其邦人”见地相合，异曲同工。好作品、伟大的幽默，一定是厚重的。嗤笑难，果戈理以他睿智的头脑、机智的揶揄与敏锐的洞察力为世人奉上一出喜剧；苦笑更不易，《钦差大臣》以“微切片”的形式，显示出果戈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主义作家的道德良知。
 画果戈理，在漫天大雪里点一盏暖黄的路灯——就像他嘴角的那一丝笑容，既寒冷，也温暖。